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11) 下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下卷 (11)

## 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

1723年6月5日,英国诞生了一位伟人,他的名字叫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之所以被称为伟人,是因为他写了一部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就其最终结果而论,它或许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本书……这位孤独的苏格兰人,即使他一生中仅完成《国富论》一书,然其对增进人类幸福的贡献,远远超过往昔所有经济学家的总和,而足以名垂青史,永垂不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和出版界,“(斯密)将说服这一代人,而支配下一代人”。

据说,亚当·斯密4岁时被一群吉普赛人拐走长达几个小时。如果他成了吉普赛人,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亚当·斯密天生具有冥思苦想、钻研问题的癖好,但是他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粗心大意。

亚当·斯密出生于英国伐夫郡沿岸的柯卡尔迪。他的父亲也叫亚当,是一位律师和文职公务员,已在小亚当出生前5个月去世了。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才20几岁就成了寡妇。她对在丈夫死后生下的唯一的儿子倍加珍爱,在她漫长的余生里,母子相依为命。斯密终身未娶,母亲是他一生中最敬爱的女性。

斯密从孩提时,就养成了独自出神和自言自语的习惯。他用他那异常敏锐的眼光观察着柯卡尔迪。从这个小镇的贵妇人直到当时仍然没有人身自由的贫穷的制盐工人。在柯卡尔迪还有同波罗的海作交易的海关人员和货主,那里流传着许多有关走私的故事。他的父亲,他的堂兄,还有斯密本人都曾当过苏格兰海关人员。虽然与海关行政部门有这样的密切关系,后来斯密却成了一个致力于彻底废除关税制度的人,这与他儿时耳濡目染的一切分不开,小斯密常常去镇上的一两个制钉作坊看工人干活,他就是在那里由这个特殊行业的分工实例,对分工的作用得到了最初的粗浅概念。

斯密小时候进入柯卡尔迪市立学校学习。这所学校在当时的苏格兰是最好的。学校校长名叫戴维·未勒,是位优秀教师。这些都为斯密获得知识提供了条件。在学校,斯密是一个勤奋、喜爱读书、记忆力很强的引人注目的学生,尤其是他的古典文学和数学在学校更为突出。不久,斯密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当时格拉斯哥大学洋溢着少见的理性的活力,它把学生从遥远的地方吸引到这个规模很小的西部大学来。斯密喜爱的数学和自然哲学得到了发展,他在这些学科的才能体现在关于天体学的论文中。在这里,他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极大的弗朗西斯科·哈切森。哈切森讲授伦理学和经济学,是一位很有创见的思想家和无与伦比的讲课大师。他的许多理论,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适度地享受快乐是一种善行。适度地享用财富也一样,因为透过财务的应用,物质才能发挥它的最大效用。”“自由是善的,人类应透过自由的思考、交谈,勇于实行具有正义感的行动”等,都为斯密以后许多思想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升入了牛津大学。他在牛津大学的几年受益最深。所有哲学、数学、自然科学、文学等,均在此奠定深厚基础,足供其一生运用。但却从老师那儿学来甚少。他后来记述讲,牛津大学的教师“往往以教授零篇断片为满足”,“而且,即使对这零篇断片,一般也是教得非常马虎肤浅”,因为教师大多是由政府支付薪俸,不像格拉斯哥大学那样来自学生,因而不再潜心进修和研究。不过,巴利奥尔学院的

图书馆弥补了他的不满，他一头扑在了浩瀚的书海中，阅读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还有一些当代哲学论著，其中包括休谟新出版的《人性论》。1748年，在克蒙斯勋爵的关照下，斯密受聘于爱丁堡教授英国文学。他被安排作一系列讲课并开修辞学和纯文学的公共讲座，这些讲座并不涉及爱丁堡各大学讲课内容，但听众踊跃，后来又增加了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课程，那就是他后来专攻政治经济学的起点。三年后，他被举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1752年，改任伦理哲学教授。

斯密热爱学生，也深受学生的尊敬。在教学中，斯密擅长对问题进行明确剖析和生动的说明，富有创造性。他从对历史的反思中形成自己的思想，并改进了他的经济理论和法学理论。在格拉斯哥大学里，他的行政管理工作很出色。他当了6年会计，后来担任教务长和副校长。尽管他粗心大意，有一次他带朋友参观工厂时自己差一点掉进工厂里的大桶里，但在处理实际事物时，他头脑清晰冷静，办事效率高。

1759年，亚当·斯密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一书，使他获得了一定声誉。《道德情操论》的名声迅速传扬海外，在巴黎文化界得到了广泛阅读和赞扬并很快被译成法文。许多名望很高的贵族、学者都争着把自己孩子置于亚当·斯密门下，因为他们知道“文如其人”。

苏格兰人向来以做事缜密著称，亚当·斯密即具有典型的苏格兰人气质。他的天性敏感、细腻、求知欲强，经常提出问题，寻求解答，无论大小事情，均能引起他的关心。日常生活中，身边的事物引起了任何变化，旋即引起他的注意，然后以惊人的记忆力牢记脑中。日后，随着情况、场合不同，他能将所学得的知识，以冷静彻底的态度，以最浅易、简洁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的著作中出现比较艰涩的文句，并不表示他已忘记如何做简洁有力的表达，只是对他所研究的对象，必须进一层说明。

在格拉斯哥，斯密经常接触城里的那些专门从事烟草贸易的商人。他是三个俱乐部的常客。其中最重要的俱乐部是政治经济俱乐部，它是大商人兼大银行家安德鲁·科克伦创立的。政治经济俱乐部的宗旨是探讨各贸易部门的性质和原则。后来，在为《国富论》收集资料时，斯密也承认他从这个俱乐部获益非浅。此外，斯密还同科克伦、威廉·坎宁安、詹姆斯·里奇讨论许多问题，这使得斯密对真实的商界有了体验。亚当·斯密渐渐确立起来的对自由贸易的优越性的信念开始影响坚信重商主义的实业家和商人。

在安德斯通小酒馆享受无拘无束的欢乐的年轻人当中，至少有三人——亚当·斯密、约瑟夫·布莱克、詹姆斯·瓦特——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比同时代任何其他人更为重要的影响。当时，瓦特被拒绝加入格拉斯哥同业公会，斯密却深具知人之明，与瓦特过往很密。瓦特后来提到，他们的谈话，“除青年人必然谈论的事情，还经常谈论文学、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问题。正是他们的交谈使我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我没有上过大学，当时不过是个机械师，因此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是我的师长。”

1764年，亚当·斯密同少年公爵巴特勒一起游览法国和瑞士（在此之前，他已辞去了格拉斯哥教授职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游览了许多地方，看到了许多新鲜事物。但他们大部时间呆在法国，尤其是巴黎城。在巴黎，斯密同许多人交往，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我喜欢斯密先生，非常喜欢。我真希望让所有的文学家和哲学家都见鬼，只把斯密先生留下。”“您将看到，他是一个道德修养高尚、注重实际

的哲学家；他爽快、开朗，完全没有我国思想家常见的那种迂腐的学究气。”以上就是当时有名的科博尼夫人与友人信中谈到斯密时对他的赞赏。斯密的魅力使另一位侯爵夫人，“一个又有才能又聪明的女子”爱上了他。但斯密不能接受她的追求。使他心如铁石的完全不是哲学，而是他青年时代对一位非常美丽而有才华的女子的痴情所致。他和她同样一生未婚，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妨碍了他们，但是，“那次失恋后，他把所有的结婚念头都永远地搁置一边了。”

在法国，许多才能出众，学识渊博的政治、经济先驱者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燃亮了探照灯。此时的斯密结识了许多著名人物，如伏尔泰、狄德罗、魁内等等。他还经常参加法国经济学家的聚会。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主张人工与贸易自由，重视农业。他们认为农业是国民财富的唯一来源，政府的政策应对农业给予优惠。而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则主张对制造部门和贸易部门给予优惠。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许多观点明显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

斯密的不少观点如：“贸易自由”、“一个国家的财富不由货币而由商品组成”等同重农主义者观点相同，但他不同意他们所信奉的基本信条，即把农业看成至高无上的。不过在后来的《国富论》中他写道：重农主义者的体系在已发表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也许是最接近真理的。同重农主义者的密切交往，每天谈论的都是经济思想和观点，使斯密经常得到新颖的对比和思考的材料，使他本来的经济思想和观点成熟起来。关于斯密和重农主义者的关系，人们往往指出斯密经济思想里的重农主义的观点，也有人讲斯密是魁内的学生，实际上斯密是批判地吸取了重农主义的本质的东西，补充了自己学说中的不足部分，使他的思想更丰富了，使他能够深刻地了解并发展自己的理论。在巴黎期间，《国富论》的大纲在斯密的脑海中已勾勒出来了。

1766年，亚当·斯密回到英国，巴特勒公爵也回到了英国伦敦。但斯密在欧洲大陆的影响仍然很大，很多人都深深地怀念着他，许多人因没有同斯密接触而感到终身遗憾。斯密的人格魅力也是巨大的。就连巴特勒也称赞道：“1766年10月我们回到伦敦，相处近三年，从未产生丝毫不和或隔阂。就我来说，在同这样的人物交往中，我获得了所能期望的一切教益。在他去世以前，我们保持着始终不渝的友谊。我将永远记住，自己失去了这个不仅具有卓越才能，而且具有一切个人美德而令人敬爱的朋友。”

斯密回到了柯卡尔迪，开始编写酝酿已久的经济巨书。在自己出生的小镇里让斯密心满意足，在这里既有工作，又有母亲在身边。既有书，每天又能在海风的吹拂下愉快地散步。爱丁堡近在咫尺，随时都能去，更主要的，对能和年轻时结交的朴实的老朋友重温旧谊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这整个时期，他的主要心血都倾注在了他的工作上。从早到晚埋头疾书，而唯一的闲暇乐趣就是一个人到海边漫步。不久，他的健康明显地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而他自己却认为一生中还没有过这样幸福，这样满意。

身体的不适，推迟了著作的完成，后来又因他的几个朋友们被卷入了当时的商业危机，陷入困境，而他竭力想搭救更让他耗心费神。1770年，因巴特勒公爵的出力，斯密获得了爱丁堡市的名誉市民证书。1772年的那场商业危机带来的灾难，危及到巴特勒家族，公爵及其顾问曾多次与斯密商量，寻求对策。在《国富论》里，斯密非常熟悉股份庞大的银行道格拉斯·赫伦银行的破产全部情况就是因此番牵涉。此时，斯密的朋友和学生普尔特尼向东

印度公司推荐斯密担任职务，使著作推迟了出版，因为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和第二篇对东印度公司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如果普尔特尼交涉成功的话，《国富论》很可能不会问世。历史不能假设，幸好斯密没有赴任于东印度公司。

1773年，亚当·斯密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于是他便带着原稿去了伦敦。在伦敦，亚当·斯密被接纳为皇家学会会员。他又花了三年时间对《国富论》进行锤炼，他发现，自己在伦敦从事研究工作，其重要性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伦敦《市民社会史》写道：“不久，《道德情操论》的作者斯密先生将提供给我们一套有关国民经济的理论，这套理论可以同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相媲美。”有人已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国富论》的重要性了。

此时的斯密深深陷入了自己对经济现实与未来的思考中，一切生活都围绕着自己无尽的思索，不再是当年巴黎文学沙龙中那谈笑风生、令人倾倒的先生了，经常以“果断的教授的口吻”谈话。他记忆力惊人，谈起话来内容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充实，半个小时谈话能写一本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话题，一旦谈起，一定会说出一些值得人们听的话。他不像在谈话，简直就是在演讲，而无论演讲的技巧多么高超，内容多么富有启发意义，毕竟是少了许多生活情趣的。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时，常常是每写一章就拿到普赖斯博士及其他学者那里去，耐心地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从他们的议论和批评中汲取有用的东西。有时斯密整章整章地重新改写，甚至否定原来的一些主张。

斯密把全部身心投入了他的著作里，虽然如此，斯密给更多的朋友留下正直、友好、博学的好印象。在《国富论》出版以前，伦敦一个有名的俱乐部的会员巴纳德教长在诗中写道：

教我品德和希腊语的是琼斯；  
斯密教我怎样思考；  
伯克教我说话的方式；  
比克勒克教我如何处世。

威廉·普莱赛尔说得更清楚：“凡是同斯密交往过的人都会记得，在平常谈话中，他丝毫不拘泥于形式，但总是井井有条，头头是道，给予听他说话的人一种愉快的感觉。”

生命最长的书是在母体内孕育时间最长的书，斯密的一个反对者曾这样说过。《国富论》的写作用了12年的时间，在写作前几乎也用了12年的构思。1776年3月9日，《国富论》终于问世了，一书惊天下！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1776年这样写道：亚当·斯密献给社会的礼物是个多么惊人的杰作啊！薄薄的一册书，洋溢着渊博的知识，用极为明快的语言表现了无比深邃的思想。斯密的朋友休谟在感叹：“真了不起！好极了！”之后，对斯密讲述他的一点不安：“这本书需要人们聚精会神地才能读进去，而目前很少公众能坐下来专心读书，因而该书最初也许不会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但我相信，该书包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敏锐的观察以及大量令人感兴趣的新奇的实例，终究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休谟的赞扬是恰如其分的，而担忧却是不必要的。《国富论》第一版在6个月内就销售一空。二次修改后，重新出版。1784年，斯密对它作了相当补充后又出了第三版，1786、1789年又出两个新版本。许多国家都出了不少版本，其中法国就有多种版本，斯密去世后的1799年又印出了第十版。詹姆斯·劳德戴尔说，在斯

密写这本书之前，我们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而《国富论》对人们的影响，远远不止在政治经济学上。

《国富论》的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富国裕民，而要达到富国裕民，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斯密认为国民财富就是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商品总量，而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并兼顾好个人、社会生产者的利益，避免牺牲另一方面的利益。围绕着这个题目，斯密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价值、市场、竞争、经济目标的分析、经济政治学和财政学等观点，建立起一座经济理论的大厦。当然，应该看到，《国富论》中有许多科学的内容，但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不科学的东西。

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最突出的特色是它的矛盾性，但在当时，那两卷四开本的辉煌巨著，以其严密的结构、深邃的结论、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彩广博的例证让人们无可争议地去接受他所得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努力使个人经济和社会利益保持一致”这个理想社会模型。

增进国民财富的最大原因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要加强分工和增加劳动力，所以斯密的《国富论》从分工写起，引出了他的价值理论，引出他关于资本的划分……斯密庞大博杂的理论被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各取所需”，创造出许多经济流派。

《国富论》写到“既没有打算，事前也不知道，我们对私人目的的追求，便促进了一个超过我们原有的更大的目的，看不见的手，于是作为作用于人类命运的一个最初的动力。”斯密创造了一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个前提，便是把人看作“经济人”。

斯密认为：“经济人”互通有无，物物互换，互相交易，是人类本性的一个根本特征。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性、经常性和不断的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和增长的重大原因。“经济人”的人们从利己主义出发达到了利他的结果。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一种内在自然秩序。经济生活就是按照这种秩序自发运动的。这种秩序就是自由发展。由经济自由立场出发，斯密得出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他极力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认为国家的作用应仅限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个人竞争，以及举办一些资本家经营无利可图的工程，国家的政权义务，是保障资产阶级有一个和平、安全地进行经济活动的环境，起到一个资产阶级“守夜人”的作用。

政府要开支，就必须有收入才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赋税。斯密提出了税收应遵循的四个原则：第一：公平原则；第二：稳定原则；第三：便利原则；最后是经济原则。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震动了当时英国的政界、学术界，以至英国的经济政策。

英国首相皮特是《国富论》的崇拜者和支持者。斯密与皮特第一次在一个宴会上相遇，当斯密进入大厅时，所有的人都起立迎接，斯密挥手请他们坐下，皮特谦逊地说：“不！您先坐下，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当然，国内也有对《国富论》挑刺的学者，但在国外引起的效应更奇妙。1780年当《国富论》被译为意大利语时，在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禁止发售，原因是“该书文体低劣，道德观不强。”但这些爱吹毛求疵的人很快改变了想法。1794年分四卷出版了《国富论》，而德国的C·J克劳斯教授给予了

最大称誉：“此书一旦被人较好地理解，将产生自《新约全书》以来比任何其他书更有意义更有影响。”

然而，不幸的是：在《国富论》出版以后，斯密的创造力好像干涸了。他从此以后再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书了。斯密现在是海关专员。繁碎的公务浪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使他流于懒散和惰性之中。他还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在研究诗歌和同朋友交往上。当他想再写几本书时，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临死时，他很为自己的做事太少而感到遗憾。不久，他又让他的朋友当着他的面把他的全部手稿烧掉，总共有 16 卷，侥幸存下来的极少。从这点可以看出，斯密的治学态度是相当严肃的，宁愿把这些手稿烧掉，也不愿把这些半生不熟的手稿公布于众，以免谬种流传。这再次体现了斯密人格的伟大。

亚当·斯密于 1790 年不幸去世。被埋在只农加带的教堂的墓地。他的坟墓上有一块朴素的石碑，上面写着：“这里是安眠着《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他生于 1723 年 6 月 5 日，死于 1790 年 7 月 17 日。”一位影响世界的巨人倒下了。但他的经济思想却永远影响着以后整个世界。

如果亚当·斯密灵魂有知，一定会惊讶于《国富论》给后世带来的震荡。各种各样的人，保守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反激进主义者，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将亚当·斯密奉为先哲。不同的人在斯密的著作中各取所爱或各取所需，有时人们或许怀疑，所有这些截然不同的东西是否能浑然一体地结合起来。然而，斯密著作中的两个部份都具有说服力。（他的矛盾似乎有一种解释不清的魔力），足以使其作为一种极为深邃的真理而享盛誉。

大卫·李嘉图等人在亚当·斯密基础上创立了完整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被尊为古典经济学之父。19 世纪上半叶的庸俗经济学家——他们把自己视为斯密的当然的嫡传弟子。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的所谓“边际革命”之后，斯密又被打扮成主观效用派的先驱者，理由是斯密所谓劳动不是指一定的小时数，而是指丧失效用和个人劳动的心理估价。而所谓价值，与其说是交换价值，不如说是主观价值。到了新旧庸俗经济学握手言和时，斯密又被赋予“真正的剑桥精神”。凯恩斯的“革命”，虽然抛弃了传统庸俗经济学，但所谓的“斯密精神”又通过新古典学派的综合写进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科书。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也受《国富论》中资本划分、价值理论的影响。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也潜在在《国富论》关于社会分为狩猎、游牧、农业、商业四阶段的划分中。可以说：《国富论》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带两重性质。一方面，他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趋向成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思想来源；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体系中的大量庸俗成分，为后来庸俗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材料。后世的经济学家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斯密和《国富论》肆意歪曲、篡改、利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斯密是误入歧途的学者，企图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熊彼特就曾说《国富论》毫无新奇之处，没有一点内容在 1776 年是全新的。约·斯·穆勒则认为“《国富论》在很多地方是陈腐的，在整体上是不完善的。”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一位经济学家要是不能从《国富论》中引出支持他的特殊观点的话来，他的学说



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特别。”

《国富论》打出了自由商品经济的旗帜，从一开始，就影响了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成为 19 世纪制定政策的首要原则，从英国影响到法国、普鲁士。二战后，《国富论》在自由市场经济上更是大显身手。1979 年，古斯·约瑟夫爵士出任撒切尔夫人第一届政府的工业大臣，在发给高级文职人员的阅读书中，就有《国富论》，因为它是“经济利益的根源书”。

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随着经济中“滞胀”的出现和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破产，在西方出现了一股“复兴”古典经济学的潮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重新燃起了研究斯密和《国富论》的兴趣。一个英国人说：亚当·斯密你现在活着该多好，英国需要你。

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首先富国裕民，发展经济。要做到这点，斯密的《国富论》可以提供的启示和借鉴太多了。

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曾评价道：“试图在经济学家的先哲祠内，为斯密确立一个适当的地位是没有意义的。读《国富论》在某些方面像谈莎士比亚的著作一样，因为我们会有新发现，我们有多少共同的习惯用语来源于《国富论》，我们有多少基本短语来源于斯密的光辉的见解。亚当·斯密不只是第一个真正有哲学修养和能力的经济学家，他是我们知识遗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我们怎样感谢也不过分”。

《国富论》从出版到现在已有 200 多年了。在这 200 年里，《国富论》的巨大影响一直没有间断过。现代人把它列为影响人类历史的 16 本书之一，作为商品经济、自由贸易的圣经。而被说服的这一代人，一定要宣称：“《国富论》将支配下一代人。”

## 明末外国传教士来中国

明朝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1573—1644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不怕路途遥远，纷纷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使当时的中国官民耳目一新，为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和发展注入了积极的因素。

耶稣会是天主教会中的一个组织，而天主教又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是维护欧洲封建势力、反对宗教改革的旧教。来华传教的多为耶稣会教士，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耶稣会的基本情况。

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迅速发展，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最后从罗马教廷中分离出来，形成路德派新教，并在西欧、北欧和北美发展它的势力。代表封建势力的天主教和新教进行激烈斗争，耶稣会就是它反宗教改革的最重要工具。耶稣会成立于1504年，该会的宗旨是破坏新教活动，维护天主教的威信，巩固和建立天主教的统治。他们不仅在欧洲进行活动，而且向东方发展，企图争取新的教徒，建立新的势力范围。

同时，欧洲资本主义也在迅速发展，也急需向外开辟市场和进行殖民掠夺。1498年，达·伽马开辟了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此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魔爪伸到了东方。嘉靖十四年（1535年），葡萄牙商人借口商船遇风，要求上岸曝晒货物，趁机占据了澳门。以后，他们又擅自扩充居住地区，建造城垣，构筑炮台，自行设官管理，澳门就这样被据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宗教与火炮、战舰是西方殖民主义进行侵略的两大工具。当时葡萄牙的武力尚不足以打开明朝的大门，他们便采用宗教手段，派遣传教士，想方设法打入中国内地。于是，一批耶稣会士便飘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妄图利用其十字架的麻醉作用，配合火炮与刀剑，打开古老帝国的大门。

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罗耀拉，1540年获得教皇保罗三世的批准，被任为第一任会长。这时，欧洲葡萄牙、西班牙殖民势力已经扩展到东方，因此，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自然和他们结合在一起。

另一位耶稣会创始人方济各·沙忽略，奉教皇之命，于1541年从葡萄牙京城里斯本出发，第二年到果阿，1549年到日本鹿儿岛。他在日本传教期间，感到中国儒家学说对日本社会的强大影响，便想进入中国布道传教。1552年沙忽略试图进入中国，但当时海禁严厉，一直没能进入中国大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中国海禁严厉，想进入中国真是太难了。这年11月，沙忽略病死于离广州仅30多英里的上川岛上。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以后，澳门就成为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一个据点。万历二年（1574年）耶稣会士范礼安与同会的41位传教士，从里斯本启程来到东方。范礼安想进入中国传教，也一直没能实现，只得居住澳门，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岩石！岩石！什么时候是你开放的时期呢！”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范礼安带着和沙忽略一样的遗憾病逝于澳门。

当时的明帝国仍是力量强大的封建大国，来华的耶稣会士经过观察分析，认识到在中国传教，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是其他武力所能奏效的。因此，耶稣会士们很下了一番刻苦的功夫。他们学习汉语，研读儒家经典；结交名士，取得士大夫的信任；同时，著书立说，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运来西洋的奇器异物，以此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在这些

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

罗明坚与利玛窦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们都是意大利人。罗明坚于万历七年（1579年）到澳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在念、写、说三方面进步很快。第二年12月，罗明坚随葡萄牙商人进入广州，向两广总督陈文峰贡献了礼物，被允准暂时住在广州市内。万历十年（1582年），罗明坚第四次进入广州，新任总督郭应聘同意他留住在肇庆。他在肇庆建立了教堂，用中文撰写《天主实录》，宣传天主教教理。这样，罗明坚成了明朝后期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但罗明坚在中国传教的时间并不久，万历十六年他回国后就没有再来中国。

利玛窦（1552~1610年）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少年时在家乡求学，后来进入罗马神学院。1582年到澳门，第二年进入中国内地，直到1610年在北京去世，在中国居留28年之久。利玛窦来华，才使天主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也为明朝后期中西文化交流开创了新局面。

利玛窦于万历十年（1582年）来到澳门，以后又到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为了传教，他勤学苦练，加上天资聪颖，对于儒家的经籍、诸子百家、中国历史，无不通晓，并能流畅地讲汉语和用中文书写。他熟悉中国的风俗礼节，身穿儒服，和名士们饮酒赋诗，畅谈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哲学伦理，谈话的时候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他在宣扬教义时，总爱从中国史书中找根据，把中国“天”的观念说成是基督教中的“天主”，所以，被当时的士大夫称为西儒。士大夫佩服其学识渊博，很喜欢与他交游。当时的名士如李心斋、李贽等人也都和他来往，促膝交谈，互赠诗文。一些达官贵人，如两广总督郭应聘、礼部尚书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等人，与他联系密切，结为知交。徐光启和李之藻甚至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利玛窦把从欧洲带来的一些所谓奇器异物，如世界地图、浑天仪、三棱玻璃镜、自鸣钟、救世主和圣母的油画像等一类东西赠送给明朝官员，以取得他们对传教活动的支持。每到一地，他还把这些东西公开陈列展览，任人参观。民众被这些奇器异物所吸引，参观的人成千上万，门庭若市，耶稣会的影响日益扩大。

利玛窦的意大利姓名是玛泰奥·利奇（Matteo Ricci）。他自称姓“利”，名“玛窦”。以后，中国士大夫就称他为“利先生”或“利子”。其他来华的耶稣会士也都仿效他，改成中国姓名，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号，叫“西泰”。

万历十七年（1589年）利玛窦迁居韶州，以后又到南京及江西南昌等地，与中国士大夫交游，畅谈社会政治、天文地理等等。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深知要使天主教真正能在中国扎根，不仅需要取得士大夫们和官员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必须取得明朝皇帝的支持。利玛窦曾对人说：“假使我们不能在南北两京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设法求得他的许可，那么将来传教得不到保障，也就什么也不能成就”。经过努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利玛窦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启程去北京拜见皇帝。第二年1月利玛窦抵达北京，明神宗朱翊钧在便殿召见。为了获得皇帝的好感，他带来了许多西洋物品，即所谓的方物。进贡的方物有：油画三幅（救世主像、圣母像和耶稣偕约翰像各一幅）、天主教经典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大小自鸣钟各一架、《坤舆万国全图》一册、八音琴一张、三棱玻璃镜两面，以及一些镜子、玻璃器皿等等。明神宗在便殿询问天主教的教义和西方的民风国政，并且赐宴慰劳。神宗原是个贪财好货的皇帝，见

到这些精巧新奇的贡品，欣喜万分，爱不释手。他把油画和万国全图张挂于宫中，建造一个亭子安放自鸣钟，还派人向传教士学习八音琴。这些外国传教士就此得到中国皇帝的喜爱。明朝政府赐给屋宇，允许他们长住北京。这正是利玛窦求之不得的，从此他便留居在北京东面的崇文门一带。这样，耶稣会士便达到了在北京居留传教的目的，也得到了中国皇帝明神宗的允准，在中国境内传教取得了合法地位。

明神宗接见利玛窦的时候，请利玛窦谈谈西洋的风俗人情。利玛窦本来是意大利人，为了夸耀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大西洋国”的人。有人一查万国地图，找不到什么“大西洋国”，就怀疑利玛窦来历不明，要明神宗把他撵走。但是明神宗不听这个意见，倒赏给利玛窦一些财物，让他留在京城传教。有了皇帝的支持，利玛窦跟朝廷官员们接触就很方便了。

利玛窦为了在中国顺利开展传教活动，深入研究儒家典籍，竭力把天主教义和儒家学说融合起来。他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到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花三年时间写成的《天学实义》就是这样的著作。在当时中国士大夫中起了不小的影响。大学士叶向高认为利玛窦宣传天主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质上一致。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利玛窦被任为耶稣会在华首任会长。

万历38年（1610年），利玛窦病死于北京，朝中大臣们因他教育民众，宣传道理有功，向神宗皇帝请求赐予葬地。神宗赐葬北京西城外，其墓在阜城门外二里沟栅栏，今天北京市委党校院内。一个外国人，死后得到中国皇帝赐予葬地，这可谓极其隆厚的待遇。

明朝后期，与利玛窦同时来华的传教士还有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费奇观、罗如望、李玛诺，意大利人石方西、郭君静、熊三拔、龙华民，西班牙人庞迪我等。他们协助利玛窦在中国各地传教，教徒日益增多。万历十一年（1583年）利玛窦于肇庆收受第一名信徒。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去世时，约有2500人。利玛窦去世以后，由意大利人龙华民继任耶稣会在华会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继续迅猛地发展。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天主教信徒增加到5000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有1.3万人，崇祯九年（1636年）有3.82万人，到了清顺治七年（1650年），竟增加到15万人。

明朝后期在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期间，中西文化交流更为活跃和频繁。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研究、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测量等科学给中国方面，起了引导的作用，为古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国天文历算有悠久的历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元代时我国的科学家郭守敬制订了《授时历》，把我国的历法提到了新高度，居世界领先地位。明代的《大统历》是根据《授时历》修订而成的。到明宪宗成化以后，因《大统历》长期不修，出现了显著的误差，经常测量不准日、月食。人们纷纷讨论改革历法。耶稣会士利玛窦一到北京，就向明朝皇帝提出改革历法的建议。他和中国的天文学家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一起从事天文历法的研究。利玛窦著有《圜容较义》一卷，是研究天体数学的专门著作，这部书对制订新历法很有作用。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一日，发生日食，明朝官员的推算与日食前后均不符合。崇祯皇帝下谕说，以后推算如再错误，就要从重治罪。于是礼部推荐礼部侍郎徐光启、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两人负责修订历法。这时利玛

竇已经去世，徐光启聘请了另外两个传教士龙华民和邓玉函及他们一起工作。李之藻、邓玉函到任后不久，先后去世，又调耶稣会士罗雅谷、汤若望来京参加修历工作。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病危时，推荐山东参政李天经主持修历工作。十月徐光启去世，由李天经继续完成了修历工作。李天经在历局十年，终于完成了新历书呈给皇上，定名为《崇祯历书》。

这次历法的修订，是在徐光启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的基础上，吸收西洋历法的优点修改而成的。

《崇祯历书》比中国古代传统历法进步了许多。《崇祯历书》采用了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它虽落后于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但比我国传统的浑天说要进步。《崇祯历书》引进了“地球”的概念和地理经纬度的概念。这不但对破除旧有的天圆地方观念有着重大意义，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推算日月食的精确度。《崇祯历书》采用了欧洲通行的天文学度量制度，这样，就把中国天文学推进到世界天文学共同发展的轨道。

《崇祯历书》是徐光启领导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于崇祯八年（1635年）编成的。当时保守势力极力反对这部历法，没能采用。一直拖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崇祯皇帝朱由检下令采用新历法。第二年四月，新历还来不及实行，腐朽的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清朝顺治初年，原来参加编制《崇祯历书》的耶稣会士汤若望，把《崇祯历书》改定为103卷，进呈清政府，立即颁行天下。

徐光启主持修订《崇祯历书》，凡对《崇祯历书》作出贡献的人，都没有忘记他们。他在临终前夕，把历局工作人员的功绩，一一开列在奏疏中呈给皇上，请求给予奖励。首先表彰耶稣会士罗雅谷、汤若望的功绩。接着表彰生员邬明著、儒士陈于阶等的功绩；对程廷瑞、孙嗣烈等11名生员、儒士在编历过程中的劳绩也都予以肯定。徐光启认为《崇祯历书》的编撰完成，是中外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1610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用望远镜观察星球运动，得出了和哥白尼相同的太阳中心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伽利略的好友、耶稣会士邓玉函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架望远镜，并于崇祯七年（1634年）献给了崇祯皇帝。汤若望特地写了一本《远镜说》，详细介绍望远镜的性能、原理和制造方法，这是在中国介绍光学原理的第一部著作。邓玉函本人也是个科学家，他与中国学者王微合著《远西奇器图说》，阐述了物理学中力学的重心、比重、杠杆、斜面、滑轮等理论，并介绍了一些简单的机械构造和钟表的结构原理。邓玉函还写作了人体解剖学专著《人身概说》，以及《测天约说》等天文学著作。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著的《泰西水法》是一部水利科学著作。介绍水利知识，介绍诸如抽水机、蓄水机等水利机械的构造、图式和原理。

火药和火器，原是中国发明和首先制造应用于战争的。通过阿拉伯人西传以后，经过改进，又传回到东方。明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新式火器开始传入中国并应用于战争之中。

明神宗万历时期，东北女真崛起，辽东地区越来越危险，明朝官员急于设法改良武器加强战斗力，来华的耶稣会士就承担了这项工作。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的后金军于萨尔浒大败明军，到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军占领辽阳、沈阳。这年，徐光启派人到澳门购置了四门西洋大炮。徐光启把挽救明王朝的危亡的任务，寄托在火器的

改进上，认为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徐光启深知西洋火器的厉害，他上疏熹宗，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加强城池的防守，抵御后金的进攻。天启二年（1622年），熹宗命兵部到澳门请西洋人进京铸造西洋大炮。人们称这种新式大炮为“红衣大炮”，又因为这种火炮最早由佛郎机人（即葡萄牙人）制造出来，故又叫“佛郎机炮”。西洋大炮在抵御后金军队的进攻中果然发挥了作用。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在进攻宁远城时，就是中了这种大炮负伤后病死的。

天启七年（1627年）明朝天启皇帝去世，由其弟朱由检当上了皇帝。崇祯三年（1630年）徐光启升任为礼部尚书。第二年，后金军队攻陷了大凌河，东北战事更为吃紧，徐光启建议建立一支用西方火器装备的精锐部队。他的计划是共建15营，每营4000人，共6万人。每一营配备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共计车300辆。西洋火炮16门，中炮80门，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徐光启这一设想由于朝廷内的政治斗争激烈，没有能够实现。

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朝又聘请汤若望监铸大炮并传授使用方法。汤若望铸成大炮20门，之后，又铸了一批较小的火炮。

汤若望为明朝修成历书并铸造火炮，明政府为了表示褒奖，崇祯帝赐给他一块匾额，并亲笔题书“钦保天学”四个大字。礼部也赠送了一方牌匾，上题“功堪羲和”，意思是说汤若望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堪与中国神话传说中掌管天地四时的羲氏与和氏媲美。

西式火器在部队中的使用，使明军军事技术也不断改进，与此同时，西式火器的制作技术和军事理论也从西方传入中国。除了军事技术之外，西方其他科技也陆续由传教士传入中国。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水利科学自然受到重视。利玛窦刚到中国时，曾与徐光启谈论水利之学。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熊三拔来华，利玛窦就把熊介绍给徐光启，说熊三拔是出色的水利学专家。后来，熊三拔编著了《泰西水法》六卷，论述了水库等的性能与作用，并附图说明，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刊行。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方农田水利的专著。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水利部分，采录了《泰西水法》的主要内容。

邓玉函是瑞士人，耶稣会士。王征是陕西泾阳人，从小就爱好科技知识，与在华耶稣会士邓玉函、金尼阁关系很好，52岁时入天主教。邓玉函和王征一起翻译了《奇器图说》。《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由邓玉函口授，由王征译绘，共3卷，天启七年（1627年）刊刻于北京。这是明代流入中国7000部西书中最早译成中文的。此书结合实用，很有特色。

王征除了与邓玉函合译《奇器图说》，介绍西方机械工程学以外，还根据西方机械原理创制新式机械。他著有《新制诸器图说》一书，收录他自己发明制作的虹吸、鹤饮、轮激、风碓、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连弩等九种机器。其中自行车及轮壶是根据自鸣钟原理仿制的。

明朝后期，西方数学传入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和《同文算指》。这两本书也是由外国传教士介绍给中国的。

《几何原本》是古代希腊的数学名著。作者欧几里得，约生于公元前330年，公元前270年逝世，是希腊的著名数学家。《几何原本》是对古希腊数学的总结和升华，在西方被认为是数学的经典著作。

耶稣会士利玛窦到中国后，发现中国士大夫中不少人对数学很感兴趣，

便想翻译此书。他曾几次与中国士人合作翻译，但都失败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进北京翰林院，与利玛窦反复讨论后，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秋，开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述。第二年春，经过三易其稿，译完了前6卷。《几何原本》共有15卷，徐光启想继续译完全书，但因利玛窦忙于传教，便中止了。译出的6卷先刻印了出来。

这本书的拉丁文本称为《欧几里得原本》，徐光启改成为《几何原本》。从此，“几何”一词成了我国数学上的专有名词。徐光启在翻译中所使用的一套术语，如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等，由于切合原意，后世延用下来。

徐光启认为《几何原本》是其他科学知识的基础，道出了数学是科学技术的基础这一确切的涵义。《几何原本》是西方数学名著译成中文的第一部书，它对沟通中西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继《几何原本》的翻译，李之藻又和利玛窦合译《同文算指》。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译成，第二年刊行。这是西方算术最早译为中文的一部书，汇中西算术于一编。全书共10卷，分前编与后编，附有别编。前编2卷，主要论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通编8卷，主要为比例、比例分配、多元一次方程组、开方等。《同文算指》介绍的西方笔算方法简便可行，清代数学家加以改进后普遍推广给中国学者。

明朝后期，随着西方耶稣会士的来华，也把欧洲的地理学知识传到中国。利玛窦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肇庆时，当地人请他把所经过地方用地图绘出来。他真的用华名、华里、计算的世界地图一幅。这图刚完成，便拿去刊印了。图中的很多错误一半是由于刻工不懂，一半是由于利玛窦当初不知道会立即付印，因此编制疏忽。利玛窦认为要使中国人重视基督教，翻印这幅世界地图是最妙、最有用的工作了。这就是他绘制这幅地图的目的。

利玛窦编制的这幅世界地图，称为《山海輿地全图》，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广东肇庆刻印。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六年，应天巡抚赵可怀在苏州刻石翻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请利玛窦在南京刻印。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之藻请利玛窦据吴中明刻本加以增订，在北京刻印。

那幅《坤輿万国全图》在当时影响很大。当时，我国的民众还相信着天圆地方的说法，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人们生存的大地是个球体，懂得了世界有五大洲，第一叫亚细亚洲，第二叫欧罗巴洲，第三叫利未亚洲，第四叫亚墨利加洲，第五叫墨瓦腊尼加洲。在今天看来，利玛窦介绍的那些地理知识还存在着错误，但它毕竟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增长了见识。另一位传教士庞迪我特地为明神宗绘制世界分洲地图，四大洲每洲一幅，图边附有文字，简略说明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物产的概况。

除利玛窦编制的世界地图外，影响较大的有《职方外纪》，共5卷，是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著作。《职方外纪》所记为五大洲各国风土物产。卷首为万国全图、五大洲总图。卷一为亚细亚总说及分说十三则；卷二为欧罗巴总说及分说十二则；卷三为利未亚总说及分说十三则；卷四为亚墨利加总说及分说十五则，以及墨瓦腊尼加总说；卷五为四海总说，有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

西方地理著作和地图的传入中国，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得以从文字和

图幅中初步了解全球五大洲的情况。同时也把西方绘制地图的投影术传入中国。

明朝晚期，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都懂中国语言和文字。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他们也认真钻研中国儒家经典著作，并把它们传到欧洲。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利玛窦把“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天启六年（1626年）耶稣会士金尼阁把“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

早期的耶稣会士是为传教而来到中国的，但是，在他们当中，对待中国所持的态度却很不一样。有一派主张在传教时持强硬的态度，不惜施用武力，甚至存有领土要求的野心。他们实际上是配合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急先锋。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西班牙人桑彻斯。他曾经向西班牙国王请求派遣军队进入中国，说：倘中国皇帝过于执拗，故意禁阻传教工作，尽可借军队之力，取消其治国权。另一派以罗明坚为首，包括后来的利玛窦等人。他们的主张完全相反，认为到中国传教，一定要做出善意的表示，不要有不好的行为；他们主张要了解中国，熟悉中国文化，所以，这一派为达到传教的目的，向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朝廷官员，介绍西洋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这在当时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也迎合了明朝政府需求，因此受到了当时官僚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的欢迎，推动他们积极翻译西洋学术著作，吸取西方科学，发展科学技术，在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统治者虽然想利用宗教宣传对中国进行侵略，但是，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由于他们的派别不同，所以还不能直接为殖民主义的侵略服务。他们来华后，主要是从事传教和著书立说，还不能进行有损中国主权的活动。而他们当中像利玛窦等人，在中国生活、工作数十年，的确为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东西方的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美利坚民族的崛起

回顾历史，总是发人深思。谁能想象，昔日刀耕火种、与世隔绝的北美大陆，竟会在 400 年之后神话般地成长为高楼林立、集现代高、精、尖技术于一身的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正是西欧殖民者的铁蹄惊起了北美印第安人的千年古梦，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原始公社社会不再平静。后起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几代欧亚移民的辛勤耕耘下，以惊人的速度强大起来，并以锐不可挡之势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这不是神话，只是一个平凡的现实。

北美洲本是古老的印第安人世代繁衍生息的故乡。

距今大约 2.5 万年至 4 万年之间，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从亚洲穿越冰封雪冻的西伯利亚，历尽艰辛困苦，来到北美大陆。

无数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来自亚洲的移民，依旧平静地生活在这块被海洋、冰川包围着的大陆上，创造着自己的独特的文化。

当 15、16 世纪，欧洲殖民者来到大西洋沿岸时，这里的印第安人还生活在生产资料公有的氏族社会阶段。印第安人大多是优秀的射手，以捕射野牛为生。他们在捕猎中发明了雪橇。同时，还懂得种植玉米、豆类、南瓜、烟草，甚至会用捕机提取海狸，用桦树皮做成桦木舟。一些地方的印第安人甚至会制作陶器、纺织纤维，例如闻名世界的玛雅文化、阿斯特克文化迄今仍闪耀着迷人的魅力，令世人惊叹不已。

不过，这个时期的印第安人在社会组织上，依然处于母权制的原始公社阶段，由氏族成员共同推选首领，由部落议事会处理部落内部事务，他们是按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有组织的原始印第安人社会。

当时的印第安人，居住分散。以一个部落为一个小团体，对外界事情一无所知：“这就使得欧洲人能够在新世界里横冲直撞，所到之处不会惊动几百英里之外的部落，也难于破除美洲的孤立状态”。对于自己的大陆“也没有一个印第安人部落或部族知晓离他们几百英里之外的任何事情，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近似种族或大陆团结一致的情感的东西”。

这样，当北美洲的先民们踏着自己缓慢的步伐进入 15 世纪时，“一手持剑，一手执圣经”的欧洲殖民者在开辟新航路的热潮中闯入这块宁静的大陆。从此，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不得不改写了。

东方世界，在西方人眼里，一直是个神秘的所在。《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描绘，更使西方人相信东方是黄金遍地的世界。直到 15 世纪后期，随着指南针、航海术的西传，造船技术的进步，才使这一梦想终于可以实现。15 世纪后期，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各国统治者，渴望获得东方财富的愿望日益强烈。但奥斯曼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与黑海沿岸，控制了通往东方社会的通道，且要征收高额的海关税收。此时“地圆说”已被普遍接受，人们相信，不经地中海也能到达东方，于是借助各国最高统治者的资助，即将改变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地理大发现开始了。

1492 年 8 月 3 日，意大利热那亚一个毛呢纺织工的儿子、水手哥伦布，在经过八年的游说之后，终于获得西班牙君主——联合执政的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支持，带上一封致中国皇帝的拉丁文介绍信和一份说明他是“前往印度各地区”作合法旅行的介绍信，以及 90 名精心挑选的西班牙水手，分乘三艘船，浩浩荡荡的从西班牙的帕洛斯港口出发了。

哥伦布的船队穿越茫茫大西洋，在浪峰浪谷间航行了三个多月。1492年10月，终于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中被哥伦布命名的、我们至今习称的圣萨尔瓦多岛。在这里，大西洋第一次像公元初年罗马斯多芬派哲学家塞涅卡预言的那样，“解开了一连串事件的链条”。哥伦布和他的水手们所看到的每一棵树、每一种植物都是新奇的，那里的居民形状奇异，头上插着羽毛，身上抹着红色颜料，操一口无法破译的奇怪的语言。哥伦布欣喜若狂，高呼“我找到新大陆了！”哥伦布称这些岛上的土人为印度人，他们热诚地欢迎这些“天上的人”。带领他们穿越巴哈马群岛。来到古巴岛西北面，拜见哥伦布认为是中国皇帝的当地酋长。

就这样，随着哥伦布船队的到来，美洲的孤立连同它的童贞一道丧失了。

新航路开辟以后，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列强加紧对人烟稀少的“新大陆”——美洲的探险、掠夺与殖民。于是在殖民者之间，殖民者与土著居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抗争与征服。

16世纪初叶，率先侵入北美的正是最先打破它的沉寂的西班牙人。1540年2月，受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总督派遣，科罗拉多率军征服科罗拉多河上游到格兰德河流域与达堪萨斯河流域的广大地区。1539—1543年间，殖民头子索托又从佛罗里达西岸登陆，侵入密西西比河流域。

法国、英国和荷兰殖民者也不甘落后，纷纷步西班牙的后尘，接踵而至，抢夺这片神秘富饶的土地。

1534—1541年间，法国政府三次派卡蒂埃西航，到达加拿大的纽芬兰岛、圣劳伦斯湾直到今天加拿大的魁北克与蒙特利尔。1605年，法国殖民者在北美新斯科舍半岛濒临芬地湾岸边建立了法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据点罗雅尔港。1608年善普伦在后来的魁北克城所在地又建立一个新的殖民据点。1682年，拉萨尔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支持下征服密西西比河流域，宣称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归法国所有，取名路易斯安那。

与此同时，逐步强大起来的英国也向美洲伸出了殖民的魔掌。1588年，英国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减少了入侵北美的阻力。17世纪初，英、法、西、荷等国为争夺海上霸权，掠夺殖民地展开了激烈的混战。英国在战争中获得优势，1606年，英国成立“伦敦公司”，在西属佛罗里达以北北纬34°与41°间开展殖民活动，同年成立的“普利茅斯公司”获得在法属加拿大以南北纬38°—45°之间的广袤大地上建立殖民地的特权。1607年5月，“伦敦公司”在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据点——詹姆斯顿，即后来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前身。1620年12月，一批英国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商船，来到马萨诸塞湾海岸，建立普利普斯殖民地。1630年，英又在新英格兰建立了马萨诸塞殖民地。

此外，荷兰和瑞典也向新英格兰一带的哈得逊河与特拉毕河流域移民。

殖民者征服美洲的历史，也是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最初殖民者来到这块大陆时，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相信这是些“天上的人”给他们做向导，供给他们粮食，教他们种植谷物。但殖民者却在殖民的过程中驱逐、杀戮印第安人，夺取他们的田地，霸占他们的田园、家产。尤为令人发指的是荷兰殖民者1641年在北美成立的新尼德兰当局，竟然颁布了悬赏印第安人带发头盖皮的规定，每个颁赏二十枚珠宝。1723年，英国马萨诸塞殖民当局，规定上缴一个印第安人的带发头盖皮，奖100英镑。

英勇不屈的印第安人，为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与殖民者展开了殊死的

搏斗。他们反压迫、反迫害的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涌现出一大批骁勇善战的英雄领袖。如庞提亚克、美塔科姆、杜堪士、黑麻、红云等统率的印第安人部落，都沉重地打击了在自己武器上与自己优劣悬殊的殖民者。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殖民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各自的最大利益，也是矛盾重重。1655年，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吞并瑞典的殖民地——新瑞典，建立了新尼德兰。经过“光荣革命”日渐强大的英国不甘落后，先是在1650、1651两年两度颁发《航海条例》，禁止荷兰商人在北美殖民地作海上转运贸易，接着又通过1652—1654年、1665—1667年、1672—1674年三次对荷战争，战胜荷兰，夺取其北美殖民地；并于1664年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取新尼德兰，改称“纽约”。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后，英国又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加拿大在北美洲殖民地的大批殖民据点。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蜂涌而入北美的过程中，英国人最终战胜所有敌手，从1607—1733年，英国先后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从而创立了“新英格兰”：

——1607年，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1606年的圣诞节，由克里斯托弗·纽波特船长率领的第一支移民船队浩浩荡荡驶出泰晤士河，满载着寻觅黄金的希望，沿着当年哥伦布开辟的航线，驶向北美。这只船队由“苏姗·康斯坦特号”、“幸运号”和“发现号”组成，船上有120多人。1607年5月，在詹姆斯河建立殖民据点；由于缺衣少食，到1608年，只剩下50多人。1618年，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的发展计划中提出，修改土地政策，鼓励移民、投资者，享有移民管理殖民地的权力，移民有权组织代议制议会，制定殖民地法律。

——1620年，马萨诸塞殖民地建立。英国早期的殖民公司在政府的特许下和丰厚利润刺激下，积极开展殖民。1620年，102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和“快乐号”船在北美登陆，建立了普列茅斯定居地。1629年，马萨诸塞公司获权在普列茅斯以北的马萨诸塞区建立定居地，实行有计划移民。经过多年的发展，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民主建设，取得很大进展。1644年组成上下两院，奠定了美利坚民族政治文化的基础。

此后，大批殖民地如雨后春笋，次第建立：

——1634年，英属北美马里兰殖民地建立；

——1636年，康涅狄格殖民地建立；

——1644年，罗德艾兰殖民地建立；

——1663年，卡罗来纳殖民地形成；

——1664年，纽约殖民地建立；

——1664年，新泽西殖民地建立；

——1679年，新罕布什尔殖民地建立；

——1681年，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建立；

——1703年，特拉华殖民地建立；

——1733年佐治亚殖民地建立……

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占有大西洋与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带。北

部的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罗德艾兰、康涅狄格称新英格兰地区，受清教徒风格影响很大，造船、工商业比较发达，是美国资本主义主要发源地。中部的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特拉华四个殖民地，称面包殖民地，盛产小麦，畜牧业也很发达。南部的弗吉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五个殖民地，为种植园殖民地，以种植园奴隶制经济为主。

北美 13 个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最初分四类，即：公司特许殖民地、自治殖民地、业主殖民地、及皇家直辖殖民地。到 18 世纪中期，演变为自治、皇家和业主殖民地三类。

至此，今日美国的基本雏形已经形成。

1605 年，英国的一部歌颂美国繁华景象的剧本中有这样一段台词：

“哎呀！朋友，他们所有的烤肉接油盘都是用纯金做的；他们所有测量街道用的测链都是用大块黄金做的；他们捕获的所有犯人都被加上金制镣铐；他们常常在节日外出，海边捡拾红宝石和钻石，并把它们挂在孩子们的外衣上和钉在孩子们的帽子上，就像我们的孩子戴上桔红色的镀金的饰针和钻了孔洞的银币那样毫不稀罕”。

在这样的诱人蛊惑下，大批在自己国家生活贫困不堪的人们，变卖家产，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那通往“黄金国度”——美国的旅程。

然而，令人绝望的严酷现实却在这些移民先祖面前展开了另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1620 年，当“五月花”号船上的乘客们为逃避国内的宗教迫害加上对北美的幸福生活的向往，来到北美时，回顾身后，“只见他们泛渡过来的汪洋大海，如今成了千重波障，万里鸿沟，将大家完全隔绝在文明之外”，没有衣服、没有粮食、没有房屋、没有药品……新大陆还只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第一个严寒的冬天来到了，移民们在恶劣的条件下，有一半人死在了异乡的土地上。

在当地的印第安人斯匡托的帮助下，他们学会了捕鱼和种植玉米。1621 年的秋天，移民们获得了第一次大丰收，他们捕获了大批水禽和野火鸡，举行了他们的第一次感恩节盛宴。他们认为，是上帝听到了他们绝望声中的呼告，看到了他们的不幸，才赐给他们这样好的收成，“让我们赞美主吧，感念他的恩慈，他的慈爱永世长存。”

实际上，尽管条件艰苦，但还是有大批移民源源涌入“新大陆”。

从 16 世纪初至今，美国的移民潮一直未曾中断。殖民开发早期的移民流主要来自英格兰。后来，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兰西人（主要是胡格诺派教徒）还有瑞士人、荷兰人等。

这样，到 1700 年，北美殖民地居民不计算印第安人在内，共有 27.5 万人。到 1775 年，已达 250 万人，黑人奴隶占 50 万人。

欧洲移民构成了美利坚民族的主体。

随着大批移民的涌入，加上英国在北美建立的 13 个殖民地建设的逐步完善，人们经济交往的增多，统一的美利坚民族渐渐形成。

北美殖民地的移民以英国移民为主。1680 年，英属北美殖民地已有移民 15.56 万人，其中十分之九来自英国，英语逐渐成为北美大陆的通用语言。

随着共同语言、共同市场、共同文化、心理、风俗习惯的形成，统一的

美利坚民族形成了。不久的将来，它迸发出的巨大能量却是前人始料不及的。

## 美国的发展与扩张

早在 1783 年，英国在北美的 13 块殖民地经过 8 年艰苦战争而独立，这 13 块殖民地组成建立了一个新的独立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当时，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会认为它会有什么强大的征兆，会对那些世界强国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可是就在短短的时间里，它的巨大潜力便通过其扩张发展显示了出来：

1803 年 4 月 30 日，美国从法国手里购进路易斯安那地区，密西西比河这个天然障碍便被它一跨而过；

1819 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了佛罗里达地区；

1846 年，整个临太平洋的西北地区并入了美国；

美国西部开发的狂潮刚消化了路易斯安那地区后，墨西哥战争又为美国取得了整个大西南和加利福尼亚地区；

1867 年，美国从俄国手里购得阿拉斯加地区；

1898 年，太平洋上的岛屿夏威夷也加入了美利坚合众国；

……

在独立战争以前的美国，当时由被英国统治的 13 块殖民地组成。英国在那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殖民地还有加拿大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直到密西西比河的广阔地区。为了争夺殖民地统治，英国与法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还运用了大量的阴谋和其他手段。

正当英国移民在北美阿巴拉契亚山的古老的绵延起伏的丘陵上辛苦劳作时，新法兰西的殖民主义者却以惊人的速度把他们的疆界向北美西部地区推进，他们占领了大量的土地，一个半世纪以来，从大湖区直到墨西哥湾的整个内地都为其所占有。

而此时，随着法国殖民地疆域的扩大，英国的边疆居民们则想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进入富饶的密西西比河谷地带。在英国驻纽约总督托马斯·唐根的唆使下，易洛魁人向法国人发动了进攻。1684 年，爆发了战争，而到 1686 年，易洛魁人却把战争引到蒙特利亚的大门了。

1689 年，法王路易十四由于拒绝承认奥兰治家族的威廉继承英国王位，使两国爆发了为争夺控制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次战争，即巴拉丁领地战争（北美殖民地谓之威廉王战争）。这场战争双方各有损失，不分胜负，战争持续到 1697 年结束。

1702 年，英法又爆发了第二次战争，即安妮女王之战，在美洲一直持续了 11 年之久，并且还是在两条战线作战：南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之间的边界地带，以及把新英格兰与加拿大分开的荒原地区。最后由于强大的英国军队在全世界都打了胜仗，而使法国与西班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种争霸战中，西班牙放弃了直布罗陀；法国则放弃了纽芬兰、阿凯迪亚以及注入哈得逊湾的各河流域地区。

尽管上次战争使英国人更接近其目标了，但是大陆内地之所有权、墨西哥湾周围的争议地区及阿凯迪亚的边界等问题的争议，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英法第三次战争，即乔治王战争。这场战争直到结束仍然没有分出胜负。

由于英国前三次战争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于是又发动第四次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七年，最后英国获得了胜利。1763 年的和约，使英国从法国手中获取了除圣劳伦斯湾两个小岛与新奥尔良以外的所有的密西西比河以东

的领土，从西班牙手里取得了佛罗里达州。此后，英国政府宣布禁止北美殖民地移民向西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去定居，尽管如此，还是有大批的边疆居民进入山那边的荒原。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乔·克拉克将军率领军队进入俄亥俄河西北的伊利诺斯打了一些仗，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尚未独立的美国对这片广阔的土地有所有权要求。终于在独立战争后的1783年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出于自己的目的，为了打散法美同盟，也为了防止法国再占领这块战略区而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全部划给了美国。

这样，美国一独立便拥有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至密西西比河的土地，而开始着手制定它的西部政策了。

新成立的美国国会者先要取得它对西部地区的无可争辩的控制权。因为早在革命开始的时候，13个州中的七个州根据他们建立时国王授予的特许状，允许他们对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区提出要求，这样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弗吉尼亚、纽约和南卡罗来纳七个州的领地实际上已扩展至密西西比河了。而从革命一开始，国家的政治家与没有领地的六个州的代表们则极力主张西部土地转让给美利坚合众国。

由于意见发生分歧，就引起了争论。经过长期的辩论，到1786年底，除了弗吉尼亚与康涅狄格的保留地以外，美利坚合众国已基本上控制了西北部地区。南方的三个州在很长时间的迟疑以后，最终也放弃了对领土的要求。就这样，美利坚合众国确保了对阿巴拉契亚山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辽阔地带的控制权和所有权。

在经过对众多建议分析评价修改后，产生了1785年法令，于当年5月20日通过，堪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立法之一。该法规定：政府所有的土地将划分成一个个6英里见方的镇区。这些镇区再细分作36个编号的“分区”。每个分区为1平方英里或640英亩。镇区既可整个儿出售，也可按分区出售，这样既满足了想得到大块土地的英格兰人，也满足了愿买小块土地的南方人。采用拍卖的方式，各州定期拍卖，最低起价为每英亩一美元。该法令还规定：第一条“基线”（东西向测量的线）应从宾夕法尼亚州界与俄亥俄河交点向正西方向划去；南北向的“行线”则应从这条基线向南延伸到俄亥俄河。一旦第一批“土行区”测量好，位于现在俄亥俄州东北角的整个地带即可对移民开放。

这部法令其实是维护投机商的利益的，因为他们在东部拍卖时，可购买许多分区或镇区，然后再把它们划分成更小的地块卖给用户。但这却妨碍了农民购买政府的土地，因为没有任何边疆人需要这样的大块土地，而且依据法令规定条件，他们也买不起。

但1787年在纽约举行的第一次拍卖会上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买主极少，叫价也十分冷落，购买额很小，总盈利按贬值的货币仅有176090万美元，这离付清国家债务所需的钱相距甚远。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制度必须修改，以便能得到较大的收入。

7月13日，国会新成立的委员会已经接受了以马纳西·卡特勒牧师建议而修订形成的法令，该法令即1787年法令。这个法令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把“俄亥俄西北领地”作为临时地区，分成三到五个领地。第二部分规定，每个领地发展为州，分三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人民由一位总督、一位秘书和国会任命的三名法官管理，同时国会还授权他们执行法律并统辖

民团。当领地的男性人口达到 5000 人时，则进入第二阶段，由立法机构与一个由总督和国会挑选的五人共同掌权。在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当人口达到 6 万时，可以制定宪法并申请加入联邦，得到批准后，与老州具有相同的地位。第三部分还有一个权利法案，规定了西北领地的人们的一些权利，使他们获得了权力保障，同时还禁止奴隶制与制定保存巨额遗产的贵族继承法。

经过这一系列步骤，国会就已经解决了西部地区的两个问题，即建立一种土地制度和设置一种政府，从而挽救了美利坚合众国，为未来的发展和西进运动扫除了障碍。

在西南边疆，那里的对手西班牙和美国都已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其冲突的直接原因就是有争议的雅祖地区。在 1783 年的英美条约中，将该地区划给了美国，条约规定北纬 31° 线是美国的南部边界。但是英西条约则规定西班牙可“保留”西佛罗里达，据此西班牙也对该地带提出要求，因为那项条款意味着西班牙政府的控制可以达到北纬 32° 线，因为那是英国管辖区边界。但两国却又都不急于先采取行动来解决冲突。西班牙是因为当时它实际上占有雅祖地区，而认为没有理由打乱现状；美国则满足于等待时机向有利方面转化。但双方都在准备利用国际形势的任何变化来促使问题得到使自己满意的解决。

如以往一样，新帝国的长期突击队——投机者和商人首先展开了争夺西南部的斗争。他们说服当局同两个软弱的克里克族酋长议定奥古斯塔条约，它把奥科尼河与图加卢河之间的一块土地转让给佐治亚州。但是，一位年轻的酋长亚历山大·麦吉利瓦雷占据了克里克族的领导地位之后，他于 1784 年 1 月 1 日写信给新奥尔良的官员要求建立克里克人—西班牙联盟以对抗美国的侵略，路易斯安那总督喜出望外而立即实行。

终于由于 1785 年 2 月佐治亚州把雅祖地区两端对移民开放这一举动而导致了克里克人和佐治亚人的战争。联邦政府亦无法阻止这一冲突，这样有可能把美国与西班牙拖入战争的危险。但是不久以后又发生的一件幸运的事件——“诺特卡峡湾争端”，并为美国提供了解决的办法。

1789 年，西班牙人对英国人侵入其太平洋领域早就气愤了，因而没收了几艘停泊在西北太平洋沿岸海港诺特卡峡湾的船只。英国抓住这个机会向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垄断地位挑战。正好那时西班牙的盟友法国处于革命的剧变中，看到一场战争是无法避免了，于是西班牙政府于 1790 年 10 月在诺特卡峡湾协定上签字，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都作了让步。在这期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英、西战争使麦吉利瓦雷看清了，在战争中将被切断其武器供应而受佐治亚人任意摆布，于是他与美国政府进行和谈，结果签订了纽约条约。克里克人以美国允许其通过佐治亚州的一个自由港口进口商品而转让了奥吉奇河与奥科尼河之间的大片狭长地带。

这两件事对西班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面临战争危险的情况下，被迫与美国进行谈判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国务卿杰斐逊认为解决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采取敷衍的办法。双方都在等待一个有利的欧洲形势来迫使对方解决问题。因此，一直拖到了 1794 年。然而幸运之神向美国招手了。在欧洲战争中，西班牙处境极为不利，与英国的结盟已崩溃；而从美国也传来了令人忧虑不安的消息：美国在肯塔基州正集结军队，以攻打当时还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路易斯安那地区，而约翰·杰伊正奉命在伦敦起草一份可能会导致英美结盟来反对西班牙的条约。经过再三权衡之后，1794 年 5 月，西



班牙新国家首脑戈多伊向美国表示，愿以雅祖地区与密西西比河航行权来交换防御同盟。

1795年10月27日，美国与西班牙签订了圣洛伦索条约。西班牙放弃雅祖地区，同意在6个月内撤走31°纬线以北的所有驻军，美国人得到了在密西西比河上从源头到河口的航行权。

但就在路易斯安那总督正准备按条约办事的时候，欧洲局势突然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796年12月29日，西班牙和英国爆发了战争，为防止英国从加拿大向路易斯安那地区进发以及美英结盟，戈多伊决定暂缓履行条约，这终于导致西班牙失去了路易斯安那地区，因为美国的边疆居民已开始采取行动而不愿再接受和平解决。

美国边疆居民发动了几次进攻，消耗了西班牙统治者的力量，使西班牙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路易斯安那地区是西班牙花费了昂贵代价的奢侈品，更加坚定了信念，必须抢在美国人或英国人动用武力以前将它全部卖掉。

这时的法国在拿破仑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法国梦想建立一个大的新帝国。1800年10月1日，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大国签订圣伊尔德丰索条约，西班牙把路易斯安那地区转让给法国，作为交换，拿破仑答应为西班牙君主查理四世的帕尔马王族的穷亲戚建立托斯卡王国。但法国随即便违约与英通过亚眠条约结束战争，而后要求西班牙交出路易斯安那地区，软弱无力的西班牙不愿冒同时与英法敌对之危险而屈辱照办。

1802年10月15日，路易斯安那地区转交给了法国，法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占有了路易斯安那地区。

这个消息在美国西部地区引起了一阵恐惧。因为西班牙有可能在恐吓下开放密西西比河口，而强大的法国是不可能这么做的。这时正是杰弗逊任总统，他同情于西部，认为美国必须买下新奥尔良与西佛罗里达足够的土地，以便使美国能控制密西西比河口。因此，他派特使在巴黎商议购买新奥尔良，同时又设法使法国相信美国全国都强烈要求战争来解决路易斯安那地区的问题。

这时拿破仑极担心在不久的与英战争中，英国会夺取路易斯安那地区，而且他的军队在镇压圣多明各起义中失败也减少了他建立帝国的热情。根据权衡利弊，拿破仑决计把路易斯安那地区出售给美国。

1803年4月30日，美法双方签订条约，法国以8000万法郎（约1500万美元）的低价把路易斯安那地区卖给了美国。由于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美国的领土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多，而且控制了一条重要的交通线，密西西比河和一个现成的港口新奥尔良。

但是，美国并不会为了低价买到路易斯安那地区而感到满足。

1810年，西佛罗里达的美国居民发动革命，宣布与美国合并；

1813年，美国借与英国的1811年战争时机占领了整个佛罗里达地区。

1819年，安德鲁·杰克逊赶走了西班牙总督而签署亚当斯—奥尼斯条约，从而夺取了东佛罗里达地区。

居住在密西西比河谷地边疆的拓荒者是卓越的殖民者，他们以自己的国家而自豪，骄傲自大，同时他们又蔑视所有其他国家，仿佛只有他们才是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几代拓荒，先辈给他们留下了永不满足现状的传统。他们在美国的扩张政策中起了主导作用，后来又把德克萨斯、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并入了美国的国土，美国的土地进一步扩大。

1825 年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显著的扩张时期。这个时期开始时，美国已有了稳固的确定的边界，按 1810 年美国 and 西班牙在亚当斯—奥尼斯条约中的协议，西南边界起于萨拜因河，伸向雷德河，西沿雷德河与阿肯色河曲折地向西伸延，然后沿落基山山脊到北纬 42°，最后转向西方到太平洋。俄勒冈地区所在地仍在英美争议中，但由于英国的哈得孙湾公司在此的牢固立足，而使形势有利于英国。所以，实际上到 1825 年以后美国人便迅速占据了落基山与太平洋之间的广大地域了，这个惊人的进展是以一系列从密西西比河边疆开始向西挺进所完成的，第一次挺进就是进入德克萨斯。

美国为使其势力进入德克萨斯，与控制着它的西班牙人之间敌意迅速增长，并且发生了数次冲突。1872 年，墨西哥逃亡者贝尔纳多·古铁雷斯和一度在美军中任军官的马吉受一次失败的墨西哥革命的鼓舞，而率部队深入德克萨斯去解除西班牙人的奴役，几乎全被杀光。在亚当斯—奥尼斯条约签订的那年，詹姆斯·朗在一次公共集会上组成了一支入侵部队，渡过萨拜因河，宣布德克萨斯共和国独立。随着墨西哥革命爆发，朗与墨西哥自由派领导人结盟而长驱直入德克萨斯，夺取了戈利亚德城，但由于他的被杀害而使德克萨斯共和国告终。

然而，最后使美国势力进入德克萨斯的，还是这些不成功的入侵。因为要使德克萨斯免遭海盗的入侵，就需要更多的人口，而那儿的居民非常少，只有 4000 人，因此墨西哥官方考虑到利用移民政策来增加力量。应密苏里人摩西·奥斯汀的要求：得到一块土地来安置他所设想的移民区，供 300 个家庭居住以开发德克萨斯。墨西哥官方批准了他的要求。他去世后其长子斯蒂芬·奥斯汀继承父业而再往德克萨斯。在开发墨西哥城时，移民活动就慢慢地开始了。到年底大约已经有 300 户人家居住在奥斯汀移民区了。

1824 年墨西哥颁布了殖民法，这又促成了在 20 年代后期的统治殖民者的活动。从 1825 年开始，美国又掀起了向德克萨斯移民的浪潮。由于奥斯汀移民区建设得好，因而有许多移民纷纷集中到那儿去了，使奥斯汀移民区一下子就扩大了许多。

本来，墨西哥官方对德克萨斯的控制是较轻的。因为他们一直对美国在墨西哥独立战争中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而心怀感激，但到了 1832 年德·圣安纳将军掌握政权，建立独裁统治后，他决心加强对德克萨斯的控制，以防止来自美国的威胁，因为美国人已显示出他们的决心：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得到德克萨斯。

圣安纳决定要占领德克萨斯并解除居民的武装，从而引起了原来支持他的德克萨斯人的反抗。为镇压叛乱，圣安纳率大军北上，首先进攻在 1832 年后被攻破的圣安东尼奥城。一支 187 人的德克萨斯部队在阿拉莫传教站土墙后面进行抵抗，这些勇敢的人为了他们的事业而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亡燃起各地移民的愤怒和力量的火焰，“牢记阿拉莫”成为一个振奋人心的战斗口号。1836 年 3 月 1 日德克萨斯的独立宣言通过。所有的德克萨斯人在斯蒂芬·奥斯汀和萨姆·豪斯带领下为他们的伟大事业进行英勇的斗争。

同年 4 月 21 日，德克萨斯的军队袭击了驻扎在圣哈辛托河畔的墨西哥军队，取得重大胜利，俘虏了圣安纳，以获释为交换条件，圣安纳承认了得克萨斯共和国的独立。

11 月，美国人占绝对多数的德克萨斯人提出赞成并入美国。

由于华盛顿政府在奴隶制的问题上采取犹豫不决的态度，同时又担心兼并将可能引起一场与墨西哥的战争，一直到 1845 年国会才同意兼并德克萨斯。

俄勒冈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新世界与旧世界殖民力量竞争的目标。在 19 世纪初，有四个国家——西班牙、俄国、英国和美国都宣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亚当斯 - 奥尼斯条约把北纬 42° 线划为加利福尼亚北界，使西班牙退出了竞争。在英国的压力下，沙皇被迫放弃了北纬 54° 40' 以南地区的一切要求。因而在北纬 42° 和北纬 54° 40' 之间地区的归属问题只有英国和美国在竞争。

最先的移民涌入俄勒冈地区，是因为英国船长科克所发现的有极高贸易的利润促成的。由于英国卷入拿破仑战争，迫使英国商人放弃了经商，因而到 1800 年时新英格兰人完全控制了俄勒冈海岸，以致所有白人都被当地的土著称为“波士顿人”，但在占领内地的对抗中，英国人的胜利已经使他们超过了美国的海上成就，从而英国人在俄勒冈地区立足稳固，以致于美国感到无力把他们从俄勒冈赶出去。

是几个空想的扩张主义者对他们的同胞的蓄意警告，使美国意识到失去俄勒冈地区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其实早在杰弗逊统治时，就派了他的秘书和威廉·克拉克组成远征军，考察进入俄勒冈地区的道路，表示了对俄勒冈地区的注意力。

在俄勒冈地区并入美国的过程中，传教士起了巨大的作用，美国在该地区的第一个移民区就是位于威拉米河谷中的贾森·李的传教站。而且在几年内，传教士几乎是随军作战，从而保存了美国在该地区一定程度的利益。贾森·李的传教说明了该地区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从而吸引了大批的移民涌入俄勒冈地区。

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是在 1842 年。有 100 多人到达了温哥华岛，他们的行动为其后的一次大规模移民开通了道路。第二年，1000 多人的队伍出发了，在经过 6 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抵达了目的地威拉米特河谷。这次大移民是俄勒冈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促进了移民浪潮。二年以后，3000 多移民的到达使俄勒冈地区的人口增长了 1 倍，美国人在俄勒冈地区占了绝对优势。

根据形势变化，美国和英国就边界再度发生争议。美国提议双方接受北纬 49° 线为界，英国的意见则相反，英国要求以哥伦比亚河为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因为它占有该河，对控制内陆皮货贸易是必要的。但是美国的公众在 1843 年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实际上，美国在俄勒冈地区的大量移民已使它接近了目标。1844 年美国国务卿卡尔·霍恩对英国大使强调，要把人口洪流推进到密西西比河岸，并将以越来越猛的势头把人口洪流推过落基山，直到哥伦比亚河岸。这使英国政府感到惊讶，于是就派了两名军官去调查，发现在俄勒冈地区，英国只有 250 人，而美国人却高达 6000 人之众，如果遭到攻击，英国人是无法保护其领地的。在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英国同时又感到俄勒冈地区价值越来越小，不值得为之一战，最终使英国决心放弃该地区。1846 年，美国与英国签订新的边界条约，使美国得到了北纬 49° 线的分界线，但温哥华岛留给了英国。这样，经过了数十年争斗，富有拓荒精神与耐力的美国终于获得了俄勒冈地区。

加利福尼亚地区远离墨西哥城，由于墨西哥未能在此设置有秩序的政

府，加上墨西哥与蒙特雷之间几乎完全没有交通线，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显然无法产生对墨西哥共和国的忠诚。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在德克萨斯、俄勒冈等地区的异常猛烈的扩张，也把大量人口带进了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当时加利福尼亚地区内已有大量的美国拓荒者。

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新英格兰的海獭皮商人，他们于1790年开始在俄勒冈海岸经营，然后就迅速地向南扩展其商业活动。正是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使美国人了解到了加利福尼亚的资源、气候以及墨西哥对加利福尼亚的控制力量的虚弱。

后来，相当多的美国毛皮商，由于深受在加利福尼亚的见闻的影响，而决定加入那里的很快发展起来的美国人的移民区。因此自从一批牛皮商的代理人在那里定居下来后，移民就一直在增加。到1830年，虽然移民在人数上仍是绝对少数，但这对该地区的经济与政治正在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情况的变化，已经引起墨西哥官员的恐慌。在那年月里，移居俄勒冈地区的移民不可避免地也要侵入加利福尼亚。因此，不管是否会发生与墨西哥的战争，经加利福尼亚侵入该地区的为数不多的几千人。仍将会为美国夺取该地区而努力，正如他们的亲戚夺取了德克萨斯和俄勒冈一样，扩张主义的真正英雄是他们，而不是在战争中征服了加利福尼亚的军事指挥官。

在使加利福尼亚地区并入美国的主要人物中，约翰·查尔斯·弗雷蒙被人们称为“开路者”。1842年，他奉命在西部查探时写的报告中，大量描写了西部的美丽与富饶，从而在美国掀起了“黄金西部”的极大兴趣。他的考察报告，不仅激起了美国那些拓荒者的西进高潮，同时也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政治家对加利福尼亚的兴趣。

在圣哈塞托战役后，圣安娜曾请求美国在墨西哥与德克萨斯之间进行调解。杰克逊就制定了一个计划，用350万美元从墨西哥那儿换取北纬37°以北的加利福尼亚。与此同时，他又向德克萨斯驻华盛顿公使沃顿提出建议，德克萨斯应把加利福尼亚划在其国界内。虽然种种计划都失败了，但加利福尼亚的内部局势却使美国对该地区产生了更大兴趣。过去的几年一直表明墨西哥当局既无足够的海军力量又无足够的陆军力量来保卫这个地区；由于几乎不存在政府管理，法律无法执行，财政混乱；随着无政府状态的不断加剧，加利福尼亚的居民都主张来一次变革，有的主张独立，有的主张并入美国或英国。

当詹·波尔克1848年入主白宫时，他制订了和平取得加利福尼亚的计划。一方面，准备用现金购买，他准备用2000万美元或4000万美元买下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另一方面，他又指令美国驻加利福尼亚大使为国务院的秘密代理人，以防止欧洲国家取得对该地区的控制为主要目的，同时又鼓励加利福尼亚转向美国寻求援助。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仿佛一切都会使加利福尼亚人走上德克萨斯的道路——宣布独立而加入美国。但意外的两件事破坏了波尔克和平取得加利福尼亚的计划：一件是熊旗叛乱；另一件是爆发了美国和墨西哥的战争。

而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爆发的那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双方都欢迎有这么一场战争。美国人想通过战争来解决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而墨西哥则希望打败跃跃欲试的美国，捍卫其遭到美国扩张威胁的领土。当时墨西哥的军队是美国的五倍，军力比美国强大，力量对比悬殊。美国的军队是未经训练过的志愿军和训练很差的民团，而墨西哥的军队则训练有素，装备良好，

经验十分丰富。对此许多外国观察家也有相同看法。因此当美国总统波尔克在寻求和平解决的同时，格兰德河以南的传阅文件都在命令军官们征集部队，准备对墨西哥作战。

就在美国总统特使斯利德尔被从墨西哥驱回后，波尔克总统认为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而在边界地区开始集结军队，但是希望墨西哥人先发动攻势以取得有利的舆论。但波尔克首先忍不住了，在 1846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美国内阁会议上要求向国会建议开战，内阁会议在通过他的建议后，他就开始起草战争咨文。但就在当晚（5 月 9 日）他接到了消息，一支墨西哥军队于 4 月 25 日跨过格兰德河，突然袭击了一支美国巡逻队，这不正是他所等待的时机吗？波尔克迅速起草了一份咨文，于 11 日向国会宣读。这份令人惊讶的文件很少提及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不满，只是说墨西哥的威胁，墨西哥的军队越过了国界，侵入了美国国土后，美国人的鲜血洒在美国国土上，为了美国的利益、荣誉和权利，美国不得不对墨西哥宣战。国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对墨西哥的战争决定。

1846 年 5 月 13 日，美国—墨西哥战争正式爆发了。

6 月 7 日，美国海军太平洋分舰队驶向蒙特雷攻下该城，几日后又夺取了圣弗朗西斯科，加利福尼亚正式并入了美国。

次年 2 月，泰勒将军取得了布埃纳维斯塔大捷而打开了通往墨西哥城的道路。

3 月 9 日，斯科特将军在墨西哥湾的韦拉克鲁斯南面登陆成功，并向墨西哥城挺进，9 月 14 日美国军队攻下了墨西哥城。

墨西哥战争最终以墨西哥的失败而结束。双方进行和谈之后，美国以 1500 万美元的代价从墨西哥攫取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两地，以科罗拉多河作为美国与墨西哥的国界线。

经过 1845～1848 年间的历史，美国取得了德克萨斯、俄勒冈以及西南部和加利福尼亚等辽阔的土地，从而使美国增加了 120 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实际上它的领土增加了一倍，并且其疆界已推进到了太平洋。

1850 年在勘测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线时，美国并不满足墨西哥条约中规定的双方国界线，因而在三年以后，美国通过驻墨西哥公使向墨西哥要求以 1000 万美元购买了一块三角地带，从而使其国界推进到了格兰德河。这样，美国今日的大陆边界基本上定下了。

1867 年，美国国务卿威廉·西沃德与俄国进行谈判，以 720 万美元的低价为美国购进了长年冰雪的阿拉斯加。一时间，人们似乎认为美国政府把钱随意浪费了。但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期，当在克朗代克河发现了储量极为可观的黄金后，尤其是在普拉霍德湾发现大油田后，使人们不禁感叹美国人的精明和美国人的先见之明。

1898 年，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发生独立革命后，加入了美国，成了美国的最后一个州。

就这样，在与发达的欧洲隔洋相对的北美大陆上，一个国力强大、疆域广阔的美国正在一天天成长起来。美国相对独立完整的民主制度，和富于创新精神的国民，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创造了发达的生产力、巨大的物质财富，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 滑铁卢之战

如果说土伦战役是拿破仑戎马一生的辉煌起点的话，那么滑铁卢之战则使这位英雄折戟沉沙。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具有重大影响。

1812年拿破仑开始了征俄之役，但惨遭失败。欧洲封建君主立即纠集上百万大军杀气腾腾地向拿破仑提出挑战。经过3个月艰苦的法国本土之战，拿破仑虽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但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终以失败告终。拿破仑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上。

强敌一去，同盟国的矛盾立即暴露出来，各国君主彼此心照不宣，各怀鬼胎。尤其是俄国，自以为在打败拿破仑的过程中立了头功，狂妄地要求吞并整个波兰，但又作贼心虚，又同普鲁士拉起关系，以防风向一变时，有个伙伴撑腰；英国见形势不妙，忙不迭地同法国、奥地利订立了规章：在必要的时候，三国应集中45万人的兵力对俄宣战。

就在同盟国君主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争势夺利之时，法国内部也乱成了一团。

路易十八一登上王位，就立即恢复了一切旧制度，好像根本就没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执政这回事似的。那些流亡回来的贵族和地主倒是吃了定心丸，为了报复而疯狂地反攻倒算，不断地向农民勒索土地，农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土地从指缝中流失。而那些以前大叫要求“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等来的却是以前教会推行的一套陈谷子烂芝麻，他们自然是把火憋在肚子里，就盼着什么时候能发泄出来。

尽管路易十八疯狂地推行复古政策，但毕竟才智有限，回天乏术。拿破仑时代的政府机关，甚至拿破仑创立的荣誉军团勋章统统保留下来，各省的地方长官也来不及更换。这些人又上窜下跳，四处活动，都想发一笔大财。而那些军官和士兵每况愈下，穷困潦倒。他们又回忆起追随拿破仑时叱咤风云的岁月，拿破仑仍然是他们心目中的勇士和伟大的统帅，只要有机会，他们还会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驰骋疆场。

当法国和欧洲都动荡不安时，被流放在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却没有闲着。他表面上装着对欧洲事务漠不关心，实际上欧洲的风云变幻，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拿破仑正伺机卷土重来，重建法兰西大帝国。

就在拿破仑苦苦等待时机之时，他以前的外交大臣马雷派人偷偷登上厄尔巴岛向拿破仑详细汇报了国内局势。拿破仑深信，法国已犹如一堆干柴，只要他去点火，就会形成熊熊烈焰。于是他立即作出决定，马上返回法国。可笑的是负责监视拿破仑的英军上校，竟认为太平无事，他正在意大利作“逍遥游”。因此这是一个天赐良机。

拿破仑这头雄狮终于开始行动了。

1815年2月26日晚，拿破仑率着仅1050名官兵的小舰队，悄悄地离开了厄尔巴岛、急趋法国海岸。而那些认定拿破仑已成为笼中鸟的英军士兵正在蒙头大睡，负责监视厄尔巴岛的英法舰队也是敷衍塞责，马虎应付而已。难怪当拿破仑于3月1日到达法国南部的儒安港，并在腊格斯发表宣言书后，各国君主先是莫名惊诧，继而似信非信，再而目瞪口呆，最后才乱做一团，穷于应付。

拿破仑以自己的果敢与机智再次博得了士兵对他的崇拜。所经之处的士

兵整团整团地倒戈而相向于拿破仑，他们狂热地奔向拿破仑，吻他的手和衣物，高兴地哭了起来。当地的农民也闻讯赶来，他们为拿破仑护送，为军队提供给养。拿破仑的军队在短时间内就达到 7000 人，真正形成了卷土重来之势。

3 月 10 日，拿破仑来到军事要隘里昂，糊涂的路易十八竟把命运交给拿破仑原来的爱将内伊元帅。这位内伊元帅骠悍勇猛，身手不凡，只是功名利禄之心太重。路易十八一召见，他就感激涕零，夸下海口，要把拿破仑装在铁笼子里运回来。为此他又向军队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没想到得来的只是一片沉默和白眼。当天晚上，一支炮兵部队哗变，投奔了拿破仑。内伊元帅想到以前拿破仑对他重用，而今竟刀兵相见，越来越焦虑不安了。正在此时，他接到拿破仑派人送来的一张纸条：“我将像在莫斯科近郊之战以后第二天那样接见您。”内伊元帅再也坐不住了，他马上召集部队于 18 日向拿破仑投降，死心塌地地效命于拿破仑。

内伊元帅一倒戈，复辟的封建王朝就土崩瓦解了。一省接一省，一团接一团，赶走了王室官吏与保王党的军官，顺从地投奔到了拿破仑麾下。路易十八只得亡命于比利时。

拿破仑仅仅用了 20 天的时间便占领巴黎。他重登皇帝宝座，恢复政权机构和重建军队。遗憾的是，许多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元帅和将军已向路易十八宣誓效忠，其中有圣西尔、麦克唐纳、乌迪诺等，莫蒂埃正在生病，原总参谋长贝尔蒂埃退居普鲁士。实际上，拿破仑只有四五个元帅可以重新任用。缺少有才能的高级军官就会影响军队战斗力。

为了反击反法联军，拿破仑进行了紧张的组织工作。他把业已征集的正规部队分成北方军团、莱茵军团、阿尔卑斯军团、比利牛斯军团等，北方军团是拿破仑打击对手的重拳，由他亲自指挥，该军团几乎占了所有正规部队人数的一半，下辖五个步兵军、四个骑兵师以及拿破仑的近卫军；后三个军团则分别防守法国东部、东南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区的要塞。

反法盟军有五个军团：英荷军团，由惠灵顿指挥；普鲁士军团，由布吕歇尔指挥，这两位都是拿破仑的主要敌手。另外还有奥地利军团、俄罗斯军团、奥意军团。

当时法军的总人数只有 28.4 万，加上后备部队亦只有 50.6 万人。而联军方面从一开始就集中了约 70 万人的兵力，尔后到夏末，还可增加后续兵力 30 万人左右，到秋季还可以继续补充。显然，力量对比于法军很不利。联军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实行四面围攻，一举打败新建的法军。

拿破仑考虑到众寡悬殊的情况，决定利用各国军队动员的时间差，各个击破。首先打垮惠灵顿、布吕歇尔两个军团，尔后掉头东进，依次迎击俄、奥两国的军队，彻底粉碎联军围歼法军之意图。为了隐蔽自己的意图，拿破仑还精心实施了战略欺骗。

就在法军厉兵秣马之日，惠灵顿和布吕歇尔却都没有采取积极的战备措施。拿破仑自然不会坐失良机，他马上命令法军向比法边境秘密集结，并迅速到达了指定的战略位置。拿破仑决定利用联军的松懈状态，首先把主力插入惠灵顿与布吕歇尔军团之间，先打惠灵顿的多国部队，再歼灭布吕歇尔军团。这时法国的前线部队与普鲁士军前卫仅隔一片密林。战争如箭在弦，势在必发。

这时，反法联军指挥官惠灵顿却认为拿破仑还留在巴黎加强防务，甚至

认为拿破仑将无力抗击联军。他陶醉在安逸舒适的生活中，没有作积极的迎战准备。

1815年6月13日夜，普军前哨向布吕歇尔报告说，他们的对面有许多营火闪动。15日，由于法军一个师长叛逃，布吕歇尔才完全看清他所面临的危险，但他仍固执地认为，以普军之实力再加上惠灵顿的支援，完全可以对付法军的进攻。

6月14日凌晨，法军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拿破仑命令内伊元帅务必拿下惠灵顿增援的必经之地卡特尔布拉斯。内伊受命之后即临阵指挥。当日法军左、右翼都突破了普军防线，把布吕歇尔军团压缩至一块狭小地域。可惜的是，内伊谨慎有余。他见左翼突出太远，部队又极度疲劳，就没有在当天攻占卡特尔布拉斯，以致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一天的战斗，总的态势对法军有利。布吕歇尔则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此时的惠灵顿还顽固地认为法军的意图是经蒙斯取道布鲁塞尔，从侧后迂回包抄他的军团。因此，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确保经蒙斯到布鲁塞尔道路的安全。当蒙斯正面的法军全部转移到沙勒罗瓦方向时，他才如梦方醒，此时他已失去了24小时的行军时间，但惠灵顿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向卡特尔布拉斯方向前进。显然，这位久历戎马的元帅心里非常清楚卡特尔布拉斯的战略意义。

面对战场形势，拿破仑紧张地分析敌情，他原计划将主力从右翼移到左翼，按预定计划去歼灭惠灵顿军团。但到16日凌晨时，敌我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一个强大的普军纵队从那慕尔开来，正在桑布里费集结，并有在利尼展开的趋势；英荷联军也正向卡特尔布拉斯集结。而法军第三军虽然完成了突击部署，但第四军却因宿营地太远而一时赶不到前线。为了确保取胜，拿破仑决定等第四军赶到再发动进攻。到下午一时，第四军才匆匆赶到。然而，普军已有三个军约8万人集结在利尼一带，布吕歇尔摆出架势来要和拿破仑决一死战，他以为以8万之众对区区的5万人，稳操胜券。但他求胜过切，竟把主力全部集结利尼村。拿破仑抓住这一破绽，决定杀鸡儆猴，先收拾布吕歇尔军团。

16日下午2时，法军展开攻击。两个骑兵师很快缠住了普军左翼，两个军展开成倒八字队形，肩并肩地向敌阵发起了进攻。旺达姆的第三军直指圣阿曼德，吉拉德的第四军指向利尼。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四军的三次冲击都被守军的排炮击退。法军凭借炮火的掩护，虽然一度占领了利尼村，但很快又被普军预备队的反冲击赶了出来。第三军的进攻同样受到顽强抵抗。这时，拿破仑急切地要求内伊率部前来支援，攻击普军右翼，以取得主动权。

但是，此时的内伊元帅处境也不妙，他的军队被惠灵顿军团缠住，困在卡特尔布拉斯以南地区。由于内伊没能够占领卡特尔布拉斯，致使法军不能互相支援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内伊元帅指挥失当直接影响法军的攻势。战场形势的发展对人数较少的法军来说越来越不利了。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拿破仑不能再等待了。他命令内伊的第一军抽身出来去攻击普军右翼；作为总预备队的第六军迅速赶往利尼前线。同时拿破仑亲自督察法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击。16日下午5点，普军的预备队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再也无预备兵力可用了。8万普军已被不足5万的法军拖得精疲力竭了。拿破仑决定出动近卫军进行最后冲击，企图一举打败普军，改变战场形势。



正当近卫军一切准备就绪之时，奉命增援的第一军开到。由于敌我识别不明，旺达姆第三军的士兵竟认为是来援的敌军，纷纷开始逃命，逼得该军的一个师长将炮口对准逃兵，强制他们安定下来。当弄清这是增援的第一军时，第一军却又掉头朝内伊方向返回，拿破仑虽大惑不解，却无暇查责。他立即收拢开始涣散的部队向普军发动新一轮进攻。

进攻刚刚发起，突然降下倾盆大雨，近卫军冒着如注的大雨发起冲击，他们有如一道倾泻而下的钢铁洪流很快占领了利尼村。布吕歇尔亲率 32 个骑兵中队，向近卫军发起反冲击，企图重新夺取利尼村。在一场混战中，布吕歇尔负伤，普军被迫撤退。利尼之战，以法军的胜利而结束。在利厄战斗中，普军死伤 1.6 万余人，溃逃 0.8 万余人，法军伤亡约 1.1 万余人。

利尼之战同时，内伊和惠灵顿也展开了一场争夺卡特尔布拉斯的激战。由于内伊行动缓慢，惠灵顿抢先攻占了卡特尔布拉斯。内伊的第二军久战不下，第一军时而开往利尼，时而开往卡特尔布拉斯，根本没有发挥积极作用。而英军在惠灵顿指挥下，作战得法并得到源源不断的后续部队的补充。结果内伊始终拿不下卡特尔布拉斯。

战斗结束时，双方各损失四五千，以后又恢复到了进攻前的态势。

双方第一次交锋至此结束了。普军抬着负伤的布吕歇尔，向北面的华费里撤退。布吕歇尔一走，惠灵顿的左翼就完全暴露了，随时有被法军迂回包围的危险，惠灵顿当即决定向布鲁塞尔南面的滑铁卢撤退。英荷联军利用树林作掩护，在骑兵警戒下逐队撤走，当主力全部撤出阵地后，第一线部队也摆脱了内伊部队的纠缠。

反法联军后撤后，拿破仑分析战场形势，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他命令骑兵军长格鲁希率右翼兵力向耿布劳斯方向追击普军，中午又命令内伊元帅向正在撤向滑铁卢的惠灵顿军团发起进攻，但直到当日下午一时左右，内伊元帅的部队根本就没有挪动，在遭拿破仑的责难后，才开始追击英荷联军的殿后部队。

6 月 17 日，英荷联军成功地撤回主力，并占领滑铁卢阵地。拿破仑试图一举拿下阵地，但没有成功。由于双方都想决战，这样一场激烈的厮杀很快就绪。此时，拿破仑拥有 7.2 万余人的兵力，英荷的兵力为 6.8 万人。英荷联军的兵力弱于法军。

惠灵顿充分发挥了精于阵地战的才干，对阵地作了精心选择。他把阵地设在布鲁塞尔以南 20 公里的滑铁卢以南约 3 公里处的一片丘陵地上，以圣安杰山高地为主战场。整个战场正面约 6 公里，纵深约 3 公里，背后是一片大森林，森林右前方约 200 米左右是英军前哨阵地霍高蒙特别墅。这样设置阵地无疑对英荷联军极为有利。在兵力配备上，把主要防御力量放在右翼，这里使用了英国的近卫军。他把杂牌部队放在中央和左翼阵地上。惠灵顿之所以如此配置，是因为一则布吕歇尔会来增援，二则可以在实战中耗敌兵力，减弱敌方的炮火优势，以利于联军的进攻。

拿破仑则准备首先集中主力突破敌方薄弱的中央阵地，占领敌方防御纵深的圣杰安山。而后向两翼扩张，把敌一分为二各个歼灭。为保证中央突破成功，拿破仑还制订了一个向敌右翼的霍高蒙特别墅佯攻，牵制和吸引敌方兵力的计划。

法军发起进攻的时间，原定为 18 日上午 9 时。但是绵绵细雨一直下到 8 点整。拿破仑吃过早饭后立即离开司令部，到各处视察战前的部队。一位炮

兵军官乘机建议拿破仑最好把发起进攻的时间推迟两三个小时，因为刚下雨后的泥泞路面不利炮兵和骑兵的迅速行动。另一方面，炮弹很可能一下子陷到湿泥当中，使杀伤效果受到影响，出身于炮兵军官的拿破仑接受了这一建议，将进攻的发起时间推迟至 11 时。

11 时半，法军炮兵开始射击。随后，法军便向联军发动攻击。担任佯攻任务的第六师奉命出动，向霍高蒙特逐步逼进。不幸的是，这位师长在占领别墅南面的一片树林后，就好大喜功，竟擅自进攻别墅的主体，三进三败，部队伤亡惨重，雷耶军长只得抽调一个旅去支援这位不成器的师长，致使进攻别墅的法军高达 1.2 万人。当法军从三个方面猛攻别墅时，英国的近卫军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在这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几乎 10 倍于己的敌军的进攻。这样一来，不但没能吸引英军的主力，反而把法军自己的兵力纠缠住了，佯攻先变成不断增兵的硬攻，继而变成徒劳无益的拼杀。

下午 1 时，拿破仑正准备下令第一军实行冲击。忽然，他通过望远镜发现敌人的后方和侧翼出现了一块黑压压的东西，拿破仑凭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断定，那是一支军队。但是友是敌？无人能断定。

不久，法军侦察兵抓到了一个普军上尉。这位上尉在受审时供出，那块黑压压的东西是前来增援的比洛的第四军。但他狡猾地隐瞒了第四军之后还有第一军、第二军的事实，拿破仑冷静地分析形势后，仍坚信法军能在敌人的援兵到达前歼灭当面之敌。他认为普军可能侧击他的右翼，但骑兵军长格鲁希同样可以侧击该军左翼。因此拿破仑要求格鲁希迅速同主力会合，以击溃普军。但当格鲁希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时间已经晚了。他的部队被普军第三军围困于华费里，要想脱身救援已是不可能了。后来，拿破仑又命令两个骑兵师去进行阻击，随后又把第六军调了上来，这样一来，为阻止普军进到滑铁卢，法军兵力一散再散，已无法集中兵力了。处置完这个突然出现的情况，拿破仑立即下令第一军的四个师发起冲击。

法军第一军一字排开。右翼的第一师一部在轻骑兵的支援下占领了拉海圣南面的果园，随后又围攻这个庄园。惠灵顿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一个营前去增援。但这个营很快被法军打败。所幸的是，拉海圣的联军守军拼命抵抗，法军一时难以取胜。法军在此处进攻受阻。

与此同时，法军第一军的其他三个师对反法联军薄弱的左翼阵地的攻击进展较快。在公路以东的阵地上，惠灵顿部署的一个仅 4000 人的旅在法军的凶猛攻击下伤亡殆尽。法军很快就占领了前沿阵地，登上丘陵顶部的法军，不断高呼胜利，队形开始出现混乱，以致指挥官难以实施有效的指挥。正在这时，隐蔽在山脊北侧反斜面上的一个约 4000 余人的英军步兵师，突然从树丛后面冲杀出来。他们在距法军仅 40 步的位置上，连续发射猛烈的排枪，随后端着刺刀冲入法军战斗队形。这导致了山顶上的肉搏战。

山顶上的肉搏战还在胜负未分之时，惠灵顿瞅准时机，及时调上了六个团的骑兵，对法军进行了反冲击。由于得到支援，英军士气大涨，法军开始招架不住，逐渐败退。反冲击的英军索性一鼓作气冲过中间地带，一直冲到法军的进攻出发区域，摧毁了法军的部分炮兵发射阵地。面对英军的凌厉攻势，拿破仑马上投入了两个旅的骑兵，居高临下，直扑运动速度已经减慢的英军，杀得六个团的骑兵人仰马翻，仓惶败下阵去，在这一回合中法军损失了近 4000 人，英军则损失了约 6500 人。

此时，争夺霍高蒙特的进攻仍在激烈地进行，到下午 3 时，双方都感到

精疲力尽，迫切需要生力军的支援。这时，拿破仑收到了格鲁希于11时半发来的报告，深知这个援军已经无望了，他当即决定，在敌人的援兵赶到这里之前，发起第二次攻击。

由于联军在拉海圣和霍高蒙特两个据点上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法军久攻不克，无法向纵深地带推进。拿破仑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拔掉这两颗钉子，尤其是敌方阵地中央正前方的拉西圣庄园。否则，就无法用骑兵冲击敌方的中央阵地，也就无法取得战斗的最后胜利。

下午3时半，炮兵再度开始了对拉西圣和霍高蒙特的炮火准备。随后，内伊元帅亲率第一军中损失较小的两个师发起猛攻。对霍高蒙特的进攻，仍由纠缠在那里的雷耶第二军担任，经过一番激战，法军又被打败。两个据点虽然面临弹尽人绝的困境，但仍坚持不动。又一轮战斗后，内伊元帅发现敌军中央阵地上的守军，似乎向阵地背后运动，他立即判断，敌军开始后退，这可铸成了大错。

法军内伊元帅判断失误，直接影响了拿破仑计划的顺利实行。

原来，英军后退其实是为了避免猛烈炮火的杀伤以减少损失。内伊不顾敌军两个据点未攻克的危险，竟擅自下令骑兵第四师和部分近卫军骑兵，共约5000人，对敌方主阵地发起冲击。4时左右，5000余名骑兵发起冲锋，他们如潮水一般再次冲上联军的阵地，惠灵顿立即调拢步兵进行方阵式的反击。当时，法军不但步兵跟不上骑兵，炮兵为误伤自己人也停止了射击，这就使骑兵难以继续前进，突破敌方步兵密集的方阵。正当法军骑兵前进受阻的时候，惠灵顿又把他的5000名骑兵预备队投入战斗。形势立即逆转，法军再次被击退。

拿破仑见骑兵的冲击被打退，害怕影响整个战场的士气，于是不顾苏尔特总参谋长的劝告，命令骑三师和近卫军骑兵师投入战斗。这是骑兵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骑兵总数超过万人，仍由内伊元帅亲自带领。至此，骑兵预备队已全部抛出。

下午5时半左右。内伊一马当先，上万把闪着寒光的马刀紧追其后，如旋风一般猛扑敌方阵地。

于此同时，联军也加强了火力，结果法军五次发动冲击，一次比一次惨，甚至在几分钟内步兵便损失了1500人。

拿破仑又一次骑马赶到部队，一面鼓舞士气，一面严令内伊务必拿下拉海圣，以便就近进行火力支援。

6时过后，法军发动了第六次冲击，经过长时间的激战，法军终于攻占了拉海圣，内伊立即把一个炮兵连调到那里占领阵地，炮火支援立即发挥了作用。冲击的法军继续突进，最后占领了英军中央阵地的部分地带。无奈后劲不足，已无法向纵深和两翼发展了。尽管内伊一再要求增援，但拿破仑手中已是无兵可调了。

与此同时，前来增援的普军也打败了拿破仑前去阻击的两个骑兵师和第六军，赶到了滑铁卢。普军一到，大大缓解了惠灵顿的险恶形势。不久，普军对法军进行迂回攻击，使惠灵顿得以抽调左翼的部分兵力，用以加强中央阵地的防御力量。

法军稳定右翼局势后，拿破仑把兵力集中到正面阵地进行攻击。现在，他清楚地知道敌军实际上已不堪一击了，关键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拿破仑把最后所剩的八个近卫军营全部交给内伊元帅指挥，要求他作最后的一

搏。

大约 4000 名身经百战的近卫军官兵，在内伊的指挥下，发动了对反法联军最后的攻击。

两个骑炮连随步兵进行冲击。但不久，中年近卫军和老年近卫军方队脱离了联系，只能各自为战了。

更不幸的是在关键时刻，老年近卫军司令身受重伤，内伊的坐骑也被打死。内伊爬起来就率军继续进攻。接着，法军突破了英军阵地。但英军并未屈服，而是突然发动反攻，普军也更加猛烈地对法军右翼发动进攻，法军两面受敌，开始出现混乱了。惠灵顿见全线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发出了攻击的信号。约 4 万名联军直扑下来，法军全线败退。

拿破仑见大势已去，只能在近卫军的保护之下，撤出了战场。英荷联军此时已疲惫不堪，追击任务只能交给布吕歇尔普军军团，普军乘胜追击，使法军再也无法集合起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滑铁卢一役，法军被彻底打败，死伤约 2.5 万人，被俘 8000 人。不久，拿破仑被流放到远离欧洲大陆的圣赫勒拿岛，这位伟人从此一蹶不振，直到 1821 年病逝。

